



高校资助工作中的不确定因素与效益开发

李仁平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与航空服务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 新的资助政策体系施行后,我国高校资助工作的主要任务已经从“找钱”变为“发好钱”和“出效益”。然而,从实践来看,高校资助工作在信息甄别、制度安排、受助者关爱教育、资助工作者素质等方面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影响着资助效益的实现。为此,应理顺体制机制,加强队伍建设,开发综合效能,实现阳光资助。同时,也呼唤关爱、包容的资助氛围的早日形成。

关键词: 资助工作;不确定因素;效益开发

中图分类号: G467.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31X (2011) 06-0085-04

2007年5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以此为标志,我国对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发生了里程碑意义的跨越:新资助体系的施行,受助面普遍达到甚至超过了20%;可以基本判定的是,在主要由政府“埋单”后,高校资助工作的主要任务已经从“找钱”变为“发好钱”和“出效益”,即确保将国家巨额专项投入科学、公正地发给确需资助的每一个对象,进而使受助者在充分感受到来自国家和全社会关爱的同时,学会感恩,奋发成才,回馈社会。

有鉴于此,从高校资助工作中的问题出发,对新资助体系加以研究并不断完善,使之综合效益最大化,就显得十分必要而迫切。

一、当前高校资助工作中的不确定因素

不确定,指难以确知,意即存在变数。正是这些“变数”的存在,客观上冲淡甚至抵消着高校资助工作的正面效益。

(一)信息甄别

1.受助者信息甄别

相较于此前的研究,本文更加关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基层村(委会)社(区)组织和民政部门普遍的粗放作风或不作为,致使信息失真且甄别困难。当前的资助对象认定体系中,真正的“硬通货”唯有贫困证明。调查表明,找村、社出具贫困证明十分容易(因为仅仅要求出一纸证明)。而基层民政部门审核时往往缺乏可资比对的原始台账,大多盖章放行——第一道关口的“失守”,使不应受助者受助成为可能。

其二,少数学生因故不愿申请或者放弃申请,导致该受助者没受助。在“问卷星”关于“你是否愿意接受资助”的调查中,选择“不一定”和“不愿意”者分别为29.13%和1.86%。^[1]实际工作中我们发现,少数自尊心较强的学生、特别内向和不自信的学生,往往不愿主动申请资助。

2.施予者信息甄别

收稿日期:2011-11-15

作者简介:李仁平(1974-),男,湖北松滋人,法学硕士,武汉职业技术学院旅游与航空服务学院党总支书记,讲师,研究方向:高等职业教育、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提出这一问题,看似杞人忧天,实则不然。高校在接受社会资助中,客观上存在境外资金的“渗透”和“冲击”。如何加强对社会资助尤其是境外资助的性质、目的的甄别,做到“为我所用、趋利避害”,也是摆在高校和资助主管部门面前的现实课题之一。

(二)制度安排

1.多头参与及效率效益

据不完全统计,当前我国直接参与高校学生资助的国家机关、社会组织有:教育行政部门、民政部门、群团组织、银行、工商联等等,如此多的部门和组织参与,形势固然喜人,但预期中的叠加效应并未出现,相反,跨部门、跨界别的沟通成本高企。这就从体制和机制层面提出了资助工作的“归口”和整合问题。

2.资助体系本身

作为旨在纾解高校学生求学困难的德政工程,资助体系本身还存在诸多不足,其完备性和科学性等问题日益凸显。

首先,临时救助措施缺乏。现行资助体系偏重于解决学生入学等常规困难,但对于学生在学期间的个人及家庭遭遇重大变故如家庭主要劳动力重病、死亡,父母离异等情况的临时救助,尚缺乏制度和资金安排。

其次,“进入壁垒”问题。以国家助学贷款为例,部分省市银行不受理外省籍学生申请的问题比较突出。助、奖学金的发放,也大多以学生成绩为衡量标准,一定程度上使旨在普惠众(贫困)生的资助出现“马太效应”,成绩平平者面临失去受助机会之虞。

再次,取向模糊。以助学金为例,三个等级的设定,特别是二等、三等的划分,不仅使操作者茫然,也极易给受助者带来微妙的心理落差。仍以国家助学贷款为例,不分专业、地域和受助者个体差异的还款规定,也使得少数学生不愿、不敢主动申请。

最后,如何兼顾不同类型高校的办学实际。譬如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已成为主体办学模式,工、学交替培养已成常态,奖、助、贷(款)的申请、评定、发放,以及还款时段如何与高职的办学实际相契合?

3.跟踪管理方面

当前高校资助的制度设计,侧重于申请、评审和发放,对发放之后的引导、监管,虽有原则性的规定,但实际上仍靠受助者的道德自律。由于资助本身的无偿性(助学贷款除外),如果引导监管长期“缺位”,势必难以有效防范“违背政策的初衷,钱没有用到刀刃上”^[2]的道德风险发生,这不仅直接影响资助工作的效益,反过来也将减弱施予者的信心。

(三)受助者关爱教育

如何实现经济资助、物质帮助与思想教育、心理支持、人文关怀的协调同步,避免失衡?于此,早有珠

玉在前;需指出的是,此前的研究,多将受助者置于客体地位;殊不知,受助者既是资助的直接受益者,同时也是积极的参与主体——不少受助者同时也是施予者(比如拿出一部分资助更困难者)。由是,开发资助工作的效益,关窍之一在于转换视角,突出受助者主体地位,强化其主体意识,进而实现爱的传递。

(四)资助工作者素质

对高校资助工作来说,一支高素质的专门队伍是必不可少的。当前,不少高校仍缺乏专门的工作机构和相应的专职人员,客观上制约着工作的精细化;此外,对资助队伍的教育管理明显滞后于工作本身,尤其是拥有裁量权的一线工作者,如学校助学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学生辅导员,鲜有专门和专业的培训教育。教育管理的“缺位”使少数工作人员对资助工作的重要性 and 价值认识不足,工作中“随手送人情”,极个别者甚至以手中的裁量权“寻租”。

二、对策建议

高校资助工作,是党和政府“民生为本”在高教领域的落实和体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要“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那么,怎样规避前述不确定因素正在和可能导致的负效应,确保资助的效益并进而实现最大化呢?

(一)强化政府责任,理顺体制,完善工作机制和载体

施行如此重要且浩大的德政工程,必须进一步强化政府的领导责任,形成“政府统一领导、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多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的资助管理体制。建议在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对口”成立助学委员会或者联席会议,分管县(市、省)长直接领导,成员单位包括教育行政部门、民政部门、群团组织、银行、工商联等,从机制上解决信息共享和“跨界”协作等问题。

助学委员会或者联席会议制度的确立,有助于将应急性的“跨界”协作举措转化为顺畅的常态机制。其实,我国高校资助工作中的“跨界”协作早已有之。比如,2006年前后对“学生提前还贷是否构成违约”的协调处置,即是典型的“跨界”协作的成功案例。

信息共享的实现寄望于一个纵向对接、横向贯通的全国助学工作一体化信息管理平台的建立。以此为基础载体,实现从政策发布、信息甄别、资格审查、申请流程、动态跟踪、社会监督等的准确高效;实现“中学—高校”之间信息资料的纵向传递;实现民政部门与教育行政部门的共享,确保学生不因升学、户口跨地区异动而失去受助资格或者重复填写资料;还利于加强对社会资助的管理,尤其是有境外组织介入的资助。

(二)加强资助工作队伍建设,推行终身责任制,

实现“阳光资助”

体制机制确立后,执行者就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在队伍建设方面,当前的主要任务有二:

1.严把队伍入口关和教育关,确保事得其人、人适其事。应选配正直无私、认真负责者居其位、举其事;同时,坚持强化教育管理,实现“良币驱逐劣币”,始终保持队伍的纯洁性,杜绝人为因素影响资助工作的效益。

2.借鉴重大工程质量监控的成功做法,推行终身责任制。我国教育领域推行终身责任制已非新闻。2008年11月下旬,时任教育部副部长陈小娅就曾指出,“农村初中校舍改造和特殊教育学校建设工程要实行终身责任制,工程质量一定要得到保障,并确保所有工程在阳光下实施。”^[9]比起有形和有使用期限的工程,资助是意义更为深远、影响难以估量的德政工程,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直接体现,必须以刚性措施强化包括村社组织、基层民政部门责任人在内的每一个执行者的责任意识,使慎终如始、负责到底,确保德政工程“在阳光下实施”。

(三)组织校企合作,开展专项研究,深入开发资助工作的综合效能

资助工作效益的实现和最大化,既靠纠偏抑负,也需要积极挖掘、开发。鉴于当前实际,以下几类问题急切呼唤着校企合作研究:

1.“资助包”的组合与使用

新的资助体系下,资助的各种形式如何使用最为合理、最有利于资助效益的实现?资助的结合点(比如与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相结合)如何选择最能规避道德风险?学校能不能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比如,清华大学“以需要为原则构建学生资助体系”^[10]的做法能否推广)等等,均是当前应高度关注并深入探究的课题。

2.如何实现过程育人、助学育人

近年来,不少高校立足实际,探索形成了成效显著、各具特色的成功案例。比如武汉大学的“自强社”,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寒窗之家”,武汉职业技术学院的“励志课堂”、“校园义工行动”等,还有的学校开展“千里寻访送真情”活动,校领导或部门负责人带队开展家访等等。于此,研究者的使命是汇聚这些鲜活的个案,找出规律,并借助合适的平台大力推广,指导各校的探索和实践,拉升资助工作的整体效应。

3.资助工作本身的绩效评估问题

广东省社会工作学会副秘书长、中山大学钟一彪博士基于课题研究,提出了资助绩效评估的“五个维度”,^[11]诚为真知灼见,值得借鉴推广。本文认为,受助学生的学习态度、自我管理和政治取向(如申请入党),均应列为评估资助工作绩效的直接和直观的目标。

三、让高校资助工作彰显人性的光辉

资助,不仅是雪中送炭的物质施予,更是扶困济厄的爱心传递;资助,离不开国家主导,更呼唤着关爱、包容的社会氛围的形成。

(一)“资助工作”或“助学工作”不必再冠以“家庭经济困难”的标签

其一,从社会认知判断来看,全社会都已经十分明了资助工作的特定对象;其二,从资助的内涵和发展趋势来看,对青年学生的资助,不应局限于经济或物质层面,还应包涵精神层面、技能层面如创业等更丰富的内涵。

(二)努力营造关爱、包容的社会氛围

在此,特别提请各类媒体(或许用心良苦,结果悬隔天壤)停止将受助者即时感恩与否或回馈多少,以媒体的放大镜加以渲染,或者动辄以道德的名义加以追问。作为社会公器,媒体的这种做法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偏狭的资助心态:我帮助了你,你必须(最好马上)作出回报——潜台词无非是:我对你是否会做出回报存疑——在这种咄咄逼人的追索下,谁愿意发自内心地相信:对我的帮助,是这个和谐美好的社会对每一个成员的关爱!试问:在这样的资助环境下,受助者究竟会产生“生逢这美好的社会,是我最大的幸运和幸福”的美好认知与情感体验,还是“对我的帮助就像一场交易(作秀)”的恶的观感?如果不幸沦为后者,那么党和国家开展资助工作的初衷,就可能完全被误读,更遑论效益的最大化。

姑妄论之,只有形成了不求回报的关爱每一个受助者和发自内心的尊重受助者的良好氛围,广大受助者才能真正沐浴在爱的阳光下,才会在成长前行的心灵里种下爱的种子、“穿起这根关于爱的链条”——惟其如此,资助工作的效益才有望真正实现最大化。

参考文献:

- [1] 问卷星.学生资助现状调查报告[DB/OL]. <http://www.sojump.com/report/425554.aspx>, 2011-07-07.
- [2] 叶林, 阮启刚.基于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高校贫困生资助问题研究[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5):86-87.
- [3] 周皓, 任维东.教育部:农村初中和特教建设工程质量将终身问责[N].光明日报, 2008-11-29.
- [4] 向辉, 杜汇良, 等.以需要为原则构建学生资助体系——清华大学学生资助工作的探索与实践[J].思想教育研究, 2010, (10):86-88.
- [5] 钟一彪.高校贫困生资助绩效的分析框架与评估模式[J].当代教育论坛(综合版), 2010, (12):57-59.

[责任编辑:张磊]

On Uncertainties and Effective Development in the College Sponsorship

LI Ren-ping

(School of Tourism and Aviation Services, Wuhan Polytechnic, Wuhan430074,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new sponsor policy system comes into force, the main task of college sponsorship has been converted from "seeking sponsorship" to "making every penny count". However, in practice, uncertainties may arise in specific arrangements such as information recognition,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caring education for the aided, recruitment of the workers in sponsorship, and etc. which impede the realization of making effectiveness. Therefore, in order to ensure sponsorship arrangements are transparent, we should straighten out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improve the qualities of the staff, and develop multiple effects. Meanwhile, we call for the prompt formation of caring and inclusive sponsor atmosphere.

Key words: college; sponsorship; effectiveness



(上接第 84 页)

Research on Modularization Assessment of Mechatronics Major's Hands-on Ability

Anwar.Apiz Adalat Ablikim Alke Mamuti Plidan Uxier

(Aks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Aksu 8430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a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practical teaching of Mechatronics curriculum, the paper puts forward a modularization assessment method, in which the practical teaching process is broken down into three modules -mechanical processing,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lectrical control with PLC. The test questions for each modular, assessment criterion and marking tables are put forward. What's more, suggestions are made on improving the hand-on teaching.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mechatronics; hands-on skills; modularized assessment